

※「行旅、離亂、貶謫與明清文學」專輯※

「行旅、離亂、貶謫與明清文學」專輯 前言

嚴志雄*

「行旅、離亂、貶謫與明清文學」專輯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所內重點研究計畫「行旅、離亂、貶謫與明清文學」第一年部分成果。研究計畫首次會議「行旅、離亂、貶謫與明清文學學術研討會」於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日至四日在中研院文哲所舉行。會議的召開，乃為此計畫成果階段性之展現，更希冀能進一步與海內外專家學者進行學術交流，互為激盪，以深化、開拓此一課題之研究。

本研究計畫聚焦於「行旅、亂離、貶謫」與書寫主體「情感結構」的關係。明清文學作品中含有豐富的空間生產元素，書寫主體因應試、仕宦、旅遊、貶謫、流放、離亂等種種緣由，在不同的地域空間、文化場域、權力結構、歷史狀況之中遊走、移動、遷徙，因之而產生的作品在某一意義上即是一種空間實踐 (a spatial practice)。這種實踐是空間的再現 (a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與再現的空間 (a space of representation) 的結合物，見之於詩、文、詞、曲、小說、戲劇等文類的作品，內含著人們的真情實感，但同時也是想像與建構的過程。

中國文學中「行旅」、「離亂」、「貶謫」的書寫傳統由來已久，上可溯源至《詩經》、《楚辭》，而至漢魏六朝之詩賦更蔚為大觀；自此之後，在唐宋元明清各代不同體類的文學作品中，皆有深刻而豐富的體現。「行旅」、「離亂」、「貶謫」為眾多文士難以避免的經驗與困境，其原因又包含自願 (voluntary) 及非自願的 (involuntary) 二類。於晚明之世，遊歷乃士人文化構成的重要因素，其中包含旅遊觀賞、漂泊歷練與求師問道。到了明清易鼎之際，天崩地坼，士大夫以及平民百姓顛沛流離者所在多有，此中經驗的再現可謂十七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大特色。嗣後，

* 嚴志雄，本所副研究員。

清朝重建政治、社會、文化秩序，清前期數帝，每有出巡或返回龍興之地祭祀之舉，不少文臣隨駕出遊。隨著邊疆擴展，由原有的東北地區拓展至西北新疆地區、西南雲貴地區，此皆成為朝廷貶戍官員及發配罪犯之地，中央與邊陲亦因而形成一個弔詭的辯證書寫結構。文學作品中的「行旅」、「離亂」、「貶謫」經驗與視野有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覆蓋的地域也更為遼闊。明清時期亦是中國與世界諸國接觸更為頻繁的歷史時代，隨著晚明天主教教士來華傳道，中西文化交流也起了嶄新的局面，西方傳教士之中國「行旅」開啟了以漢文書寫天主教文本以及以漢文翻譯天主教文學作品的傳統。總而言之，明清時期中心與邊陲、域內與域外、東方與西方、熟悉與陌生的互動互為較前代頻仍、強烈，而極多文學作品帶有顯著的「行旅」、「離亂」、「貶謫」色彩，極具研究價值。

本次為期兩天、共有五場的會議以「行旅、離亂、貶謫與明清文學」為主題，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以此議題為立足點，從中開展出不同的理論性探討，其中包含中心與邊陲的辯證關係、離亂經驗之記憶、境內與域外的再現 (representation) 與想像 (imagination) 等等。本專輯選載會議論文四篇，以供學界參考。

嚴志雄以〈流放、帝國與他者——方拱乾、方孝標父子詩中的高麗〉為題，探論清初為清廷流放的方拱乾、方孝標父子的詩歌創作。除了生命，大清帝國似乎剝奪了方氏父子的一切，將之放逐到離帝座最遠的極邊之地。嚴文欲探究，方氏父子如何在邊陲之地「建構」、想像、思考、渴望帝國。他們在戍所仍吟詠不輟，其詩作可以看成一個寧古塔「歷史敘事」(historical narrative)，而其中浮現的流人主體性 (subjectivity) 反映了種種帝國與「他者」(the other) 的相互建構。嚴文分析方氏父子書寫「他者」高麗的若干詩作，這是他們作品中相當特殊的樣品，數量雖不多，但藉之頗可突顯此一流放詩學 (poetics of exile) 中，帝國語言的特質、權力的結構，以及流放文士的精神狀態、其對身分與階級的思考等等。清初東北流人文士的文學遺產有待深入探論，極富研究價值，而當流放、遷移 (migration)、離散 (diaspora) 已成為現當代人類生存經常不得不面對的處境和狀況時，我們回顧、探究中國前現代時期的一段先行經驗，也許不無一定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林玫儀以〈卷旒心苦苦難伸，始信紅顏命不辰——晚清女作家左錫璇、左錫嘉在戰亂中的情天遺恨〉為題，聚焦左錫璇、左錫嘉兩姊妹及其夫婿作品，探析兩姊妹在晚清太平天國戰爭、離亂中之經歷與生命情調。「卷旒心苦苦難伸，始信紅顏命不辰」，林玫儀指出：「亂世才女，其處境實堪悲憫。」林文在詩詞作品輯錄整

理、考證詩人詩作上花了極大力氣，文章不僅披露了極為罕見的材料，更據之而將他們的生平事蹟以及人際網絡關係重新建構出來。

張暉的論文為〈詩與史的交涉——錢澄之《所知錄》書寫樣態及其意涵之研究〉，從「詩史」的觀念出發，探論錢澄之《所知錄》一書。明清之際，錢澄之曾隨南明流亡政權身涉閩、粵艱險之地，積極從事抗清復明。作者認為，錢氏所著之《所知錄》可視為「他精心撰寫的南明史書」。錢氏以詩作為自己的年譜，使之具有記載個人歷史及時代歷史的功能。張文指出，《所知錄》中的詩篇有尊永曆而貶隆武的史觀，以及寓含褒貶以表彰忠臣的特質，並一一探論了《所知錄》中的詩篇、史、記、敘事的書寫樣態。作者最後指出，有必要調整閱讀策略，把《所知錄》閱讀成一本記載錢澄之個人生命的詩集，將記的部分視為詩篇的歷史箋釋與再敘述；換言之，即是以詩為正文，歷史記述為注解。此一策略改變了前此閱讀此書時，以史事之記為正文，詩為附錄的觀看角度。

如何自明代出版物，見得人們實踐地理知識以及展視對古代地理知識的認同與再梳理？許暉林〈朝貢的想像：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異域論述〉一文有深入的討論。許文從比較日用類書的版本出發，主要討論了下列三個問題：一、宋代官方類書所提供關於諸夷知識的分類架構，是如何被明代的日用類書所吸收與改變？這樣的改變在晚明又有何社會、文化意義？二、我們要從哪個角度來理解晚明日用類書中「諸夷門」的「日用性」？三、晚明日用類書中的異域想像在當時中國對於西方地理知識的接受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藉由回答這三個問題，許文試圖說明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中的異域論述，如何能夠成為我們理解晚明人對於世界的想像方式的重要線索。作者認為，晚明日用類書在不斷增補、改訂、重刊的過程中，結合了類書實用性論述與正史諸夷書寫的模式，打破過去日用類書中堅持的文化／文本界線，重新組織包括《山海經》在內的古代地理知識與元、明以後實證地理知識之間的關係，在朝貢體系崩潰的政治情境下，重新想像朝貢關係。這樣一種存在於晚明日用類書中對朝貢體系的重新想像，或許可以被理解為對晚明西方世界地理知識架構的另類反抗。